

■前往德國學習火炮技術的中國人



■日本方面繪製的旅順地圖

# 爭與戰，歷史思索在其中

為紀念甲午戰爭爆發120周年，由內地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與香港海防博物館聯合舉辦的「甲午：爭與戰」展覽日前在香港開幕。是次展覽的一個顯著特色是：就時間的角度而言，從戰前、戰爭中、戰後的視角出發，陳列出了與戰爭相關的展品；從空間的角度而言，則匯集了清國與日本雙方的文物，可謂角度多元。展覽勾勒出了清日兩國在近代化博弈中的輸贏，也點出了「國民國家必然擊敗封建政權」的歷史宿命。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北洋水師使用的望遠鏡



■丁汝昌的短劍



■北洋水師使用的炮彈

從事實可以看出，從戰前到戰後，清國與日本始終都不在一個相同的位階上進行爭與鬥。這其中最為重要的原因便是：日本以成熟的國民國家的形態，用成功而徹底的近代化體制，徹底擊敗了清國的表面威武，但內核依舊是封建政權的腐朽集團。這種鮮明對比，從一件件展品的陳列中便可以感悟到。

## 為誰而戰：堅定與彷徨

當近代化的啟蒙思想以西學東漸的方式進入日本之後，近代化的「國家」、「國民」這兩個觀念的形成便成為日本與當時的清國、朝鮮最大的差別。「國家」、「國民」是同時存在的。「國家」觀念和意識的存在，意味着統治者和國民之間形成了契約關係，也構成了價值一致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共同體，並且以共同體的準則進行公共管理與服務。真正意義上的「國家」的確立，代表着傳統的地域、氏族、階層等等社會群體分類，在一定範圍內被弱化，而超越這些差別的共有身份便是「國民」。

共同的「國民」身份，意味着共同的信仰、追求和認同。「國家」並不是一個抽象空洞的概念。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國家」是精英與大眾的共同體，國民有了集體意識與責任意識。因為國民是國家的一分子，是國家的主人，才通過國會的議員審議財政預算，進而形成各階層國民對國家大政的參與。由此，國家的利益、命運才會與國民的價值選擇得以連結。

展覽中涉及到北洋水師的文物，例如實物性質的炮彈、望遠鏡、清國官員往來的書信，以及資料性質的照片、圖文等，大致概括出了這樣一種態勢：清政府確實重視海軍的建設，將海軍高階指揮人才送往歐洲培養、聘請洋人擔任教官和指揮官、興建並運營與海軍有關的學校、修建旅順要塞等等。這些努力不可謂不多。但是，事物的另一個層面則是，清政府對世界大勢和國際環境缺乏認識和了解，對於日本這樣一個國家更是毫無深度性質的把握。展覽中有不少日本開闢在戰前已經繪製的中國地圖，大多涉及威海及旅順區域；但是清國方面則毫無建樹可言。可以這樣概括，「國家」形態的缺失、「國民」身份的缺位，使得北洋水師這樣一個龐然大物，在某種意義上其實是徒有其表且羸弱不堪。為誰而戰的堅定與彷徨令北洋水師最終失去了存在的可能。

## 祈戰死：國民總動員

晚清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梁啟超先生在戊戌



■北洋水師軍艦舷窗



■日本方面用作宣傳的畫報

變法失敗之後流亡日本。他在文章中曾經提到，某日看到日本軍人在路上經過，送別軍人的親屬以寫有「祈戰死」字樣的條幅而激勵。這一場景令梁啟超大為震撼。他認為，在日本，文學詩歌多以參軍為榮、為傲、為豪；但在中國，文學作品自古則多描繪參軍之苦痛和疲憊。在近代化之後，日本軍人這種作戰精神，很大程度上與日本的戰時國民總動員有關。

此次展覽的文物，有不少是日本在清日戰爭時期出版的畫冊、畫報。戰爭狀態之下，這些畫冊、畫報實際上便是日本政府用作國民精神總動員的一種宣傳工具。從這些畫冊、畫報的內容上可以看到，當時的日本政府力圖向國民展現日本軍隊的作戰英勇，同時也在畫報中極力貶低和醜化敵國軍人的形象。由此，激發起國民參軍奔赴前線的意志和決心。另一方面，在對外層面上，宣傳畫報和隨軍記者的攝影照片，則為日本起到了爭取國際輿論的重要作用。這種內外並行的宣傳手段，為日本贏得戰爭奠定了堅實的國民基礎和國際環境。

反觀清國，則部分軍人的勇武無法喚起民眾的支持和參與。在戰爭進行中，清國無法、也不願進行廣泛和有效的國民動員，更無法讓民眾和軍隊、國家形成強有力的命運共同體。從一些已經披露的戰爭資料中可以看出，日本軍隊在清日戰爭一開始，便已經瓦解了清國民眾甚至是部分文化精英的對決意志。日本在戰爭中，從容地以清國存在的「滿漢矛盾」為突破口，將日本軍隊描繪成了驅逐滿洲政權、光復漢人文明的「正義之師」。這一做法某種程度上起到了實效，使得不少清國的漢族地方士紳文人在戰爭中對清國較為缺乏支持和認同感。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小說《坂上之雲》中有這樣一段對白，當日本詩人正岡子規詢問參加海軍的好友秋山真之「清國為何

戰敗」時，秋山的回答是「那些漢人根本不願意出力」。

## 國民國家與封建政權的對決

實際上，在甲午戰爭爆發之前的四年，日本已經完成了國家體制改造，實現了眾議院的選舉。彼時國會中佔據多數席位的，是與日本政府相抗衡的民黨；而支持政府的吏黨則一直處於少數地位。這種「朝小野大」的議會格局一直到清日戰爭結束都未能改變。因此，當日本海軍曾經試圖擴充軍備時，國會一度反對過撥款申請。但是，最終在共同的國家觀念和國家利益之下，議員們拋棄了黨派之爭，通過了擴軍預算。而就大眾而言，在共同的國家意識與國民觀念下，民眾掀起了募捐運動，以便籌集款項從歐洲購買軍艦。

作為封建舊政權的清國，雖然皇權至高無上，似乎可以乾綱獨斷，但是，整個國家體制被各種派系和集團所掣制，運作效能低下。從政者有門戶之見、派系之見、地域之見，偏偏就是沒有國家觀念。清國廣大的民眾更是對戰爭冷漠而無感。由於缺乏國家意識，清國軍隊派系林立、弊病叢生。從政從軍者，只將自己看作是天子與皇權的家臣，而未將自己看作是國家的主人、國家的國民。

如此一來，清國大眾也就對現實中的國家不會產生強烈共鳴，有時甚至出現啼笑皆非的現象。在清日戰爭中，日軍曾俘獲清國南洋水師的戰艦。戰爭結束之後，南洋水師指揮官甚至親自去信日本軍隊，希望歸還南洋水師戰艦，其理由便是：與日本作戰的是北洋水師而非南洋水師。這種只有集團派系私利而無國家觀念的行徑，讓對手日本大跌眼鏡。可見，清日戰爭，實質上就是一場國民國家與封建政權的對決，而前者必然擊敗後者。

# 丁汝昌悲劇的文化啟示

在今次海防博物館展出的展品中，有兩件書法展品尤為引人注目。一件是日本明治時期的海軍元老勝海舟為北洋水師殉國提督丁汝昌撰寫的祭文；另一件則是時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明治維新元老伊藤博文為慶祝日本戰勝清國而撰寫的《海陸大捷歌》。這兩件展品均出自日本重要人士之手，且主題和意涵甚大，有其文化啟示則極為沉重，值得一次次回味和思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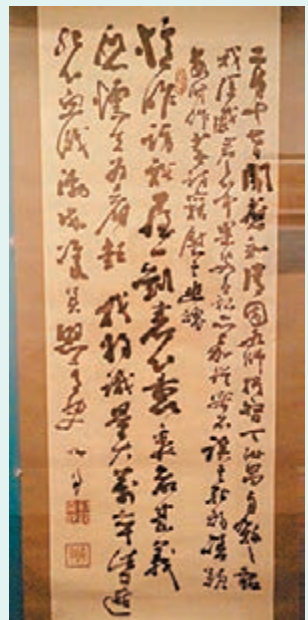
清日戰爭爆發前，丁汝昌曾經兩度率領北洋水師訪問日本。作為一個大國海軍將領，丁汝昌的軍人風範和文人學識，頗受當時日本軍政界、特別是海軍界人士的欽佩和讚揚。在這段短暫的和平時光中，丁汝昌和日本海軍元老勝海舟成為知己，勝海舟曾贈送短劍予丁汝昌表示友誼。甲午一敗，丁汝昌自殺殉國，消息傳回日本，勝海舟回憶起與丁汝昌交往的歲月，寫下了今次展出的追悼文，並發表在日本報紙上。本國海軍元老追悼敵國將領，此一做法轟動彼時的日本。

勝海舟在祭奠丁汝昌的文章中寫道：「二月十七日，聞舊知清國水師提督丁汝昌自殺之報，我深感君之心果決無私亦嘉從容，不誤其死期，嗟嘆數時，做無詩慰其幽魂。憶昨訪我屋，一劍表心裡，委命甚義烈，儒者為君起，我將識量大，萬卒皆送死，心血濺渤海，雙美照青史。」從這段文字中可以強烈感受到，勝海舟對故交知己的殞命頗為傷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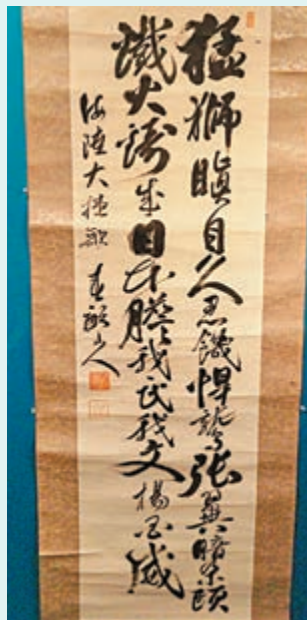
而另一個歷史片段則是，當北洋水師的大本營劉公島陷落之後，搭載丁汝昌靈柩的「康濟」號運兵船駛出軍港時，日本聯合艦隊司令伊東祐亨下令所有日本軍艦降半旗、鳴放弔喪禮炮以向丁汝昌的殉國表示致哀。在丁汝昌自殺前，伊東祐亨寫下了一封勸降書致丁汝昌，信中尖銳指出，「以閣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審矣。至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通變之所由致也。」在伊東祐亨看來，正是墨守成規、食古不化，徹底導致了清國的失敗，將戰敗責備於丁汝昌等軍人並不公平。

作為戰勝一方的日本，除了表現出對丁汝昌殉國的敬意之外，更多則是展現了勝利的喜悅。首相伊藤博文的《海陸大捷歌》將日本比喻為崛起的猛獅，顯現出了強烈的勝利榮耀感。如果結合到文化藝術層面，從日本近幾年來拍攝的幾部大型歷史題材的影視劇如《坂上之雲》等來看，明治時期的日本，對清日戰爭確實存在一種內在的「矛盾」：一方面，對清國的高階將領如丁汝昌、鄧世昌等，有很大的崇敬之意；另一方面，作為戰勝一方的日本又有一種難以抑制的優越感，有時在戰場上公然背棄已經宣誓遵守的國際法則，對清國軍民大肆殺戮，造成了旅順大屠殺的慘劇。

從勝海舟追悼丁汝昌的祭文，到伊藤博文的祝捷詩歌，再到伊東祐亨的勸降書，這一切都提示國人這樣一個不可忽略的事實：直到清日戰爭完全結束、勝負未料之前，日本一直將清國視為強大國家，將北洋水師視為強大對手。這不僅僅是心態上的，也是千百年來在中國文化影響下的日本對兩國關係的一種現實定位。也正因為如此，當時的日本對丁提督的敬意，一半是對丁汝昌個人氣節的讚揚和肯定；另一半則是千百年以來直至清日戰爭結束時，日本一直將清國視為強國的尊敬。對手雖然被擊敗，但是因為其強大，也值得尊重。不過，歷史最值得中國人深思的是：伊東祐亨為丁汝昌鳴放的弔喪禮炮，不僅送走了運載丁汝昌的靈柩，其實也送走了日本對中國最後一絲的文化崇拜和尊重。從那以



■勝海舟為丁汝昌而作的追悼文



■伊藤博文寫下的《海陸大捷歌》

後，直到抗戰結束，日本一直視中國為弱國。

對手的尊敬並非從天而降。從文化角度而言，能夠謙虛學習鄰國甚至是敵國的文化與思想，將鄰國視為強大的對手而加以重視，不盲目自大、空泛浮誇，這對於一個近代化國家而言，是難能可貴的文化素養。今日的中國與日本，人員往來、跨國婚姻、資本與產業流動、文化交流，已經密不可分。維繫這種和平主義的格局顯得格外重要和緊迫。戰火摧毀了無數人的幸福與友誼，世代友好則奠基於彼此的尊重。這種尊重，若以丁汝昌的悲劇作為啟示，則是：睦鄰之道，首在自強。惟有自尊、自強，才能為列國尊重，才能融入世界文明的大勢。

■文、攝：徐全